

中國與東亞的教育傳統(二)

東亞的書院傳統與近代教育的轉折

李弘祺◎編



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

HIMALAYA FOUNDATION

中國與東亞的教育傳統(二)

東亞的書院傳統與近代教育的轉折 李弘祺◎編

中華文明二十一世紀新意義

■ 會址

105台北市松山區
復興北路167號9樓之1

■ 電話

886-2-2544-8282

■ 傳真

886-2-2718-5850

■ 網址

<http://www.himalaya.org.tw>
<http://www.npo.org.tw>
<http://www.npobook.org.tw>

■ 電子信箱

hmfoundation@himalaya.org.tw

ISBN 986-80798-6-1



9 789868 079861



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

HIMALAYA FOUNDATION

中華文明二十一世紀新意義系列叢書 7

中國與東亞的教育傳統（二）

東亞的書院傳統與近代教育的轉折

李弘祺◎編

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與東亞的教育傳統. 二, 東亞的書院傳統與
近代教育的轉折 / 李弘祺編. -- 初版. --
臺北市：喜瑪拉雅研發基金會, 民 95
面：公分. -- (中華文明二十一世紀新
意義系列叢書：7)

ISBN 978-986-80798-6-1(平裝)

1. 教育 - 中國 - 歷史 - 論文、講詞等 2.
書院 - 中國 - 歷史 - 論文、講詞等 3. 教育 -
東亞 - 歷史 - 論文、講詞等

520.92

95012950

中華文明二十一世紀新意義系列叢書（七）

中國與東亞的教育傳統（二）

東亞的書院傳統與近代教育的轉折

出版：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七月 數位初版
編者：李弘祺
初版 / 發行：財團法人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
地址：台北市復興北路167號9樓之1
電話：(02) 25448282
傳真：(02) 27185850
網址：www.himalaya.org.tw
E - mail：hmfdtion@himalaya.org.tw
定價：新台幣600元

郵政劃撥：17523887 • 財團法人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

未經同意擅自翻印、改作或以其他方式侵害著作權者
著作權人當依法追究其民刑事法律責任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會調換

總 序

喜瑪拉雅基金會董事長韓效忠先生是一位常與學術界朋友交往的企業家，他在企業經營之外平生最關心的事就是中華文化發展的前景，因此他與學術界朋友們聚會時總要談到如何支持中華文化的研究，並用以作為基金會執行其主要業務的參考。喜瑪拉雅基金會對研究中華文化的支持最初著重於與其他基金會和學術研究機構進行學術合作，共同支持海內外的中華文化研究計劃，後來累積經驗漸多，韓董事長與基金會執行長江顯新先生遂逐漸萌生念頭來推動一項較長久的研究計劃，藉以探討中華文化在廿一世紀來臨之時為人類文化的發展扮演更主動、更重要角色的可能性，並希望藉著企業界與學術界的共同努力，促使曾在人類文明史上創造過若干高峰的中華文明再發展新的境界，就像喜瑪拉雅山峰一樣，成為人類文明的新頂峰。

我個人與韓董事長及江執行長都是台大前後屆的校友，平時常有往來，近幾年來因為喜瑪拉雅基金會與我負責的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合作支持研究計劃，因而更有密切的交往，建立深厚的友誼，所以當他們二位與我商量如何策劃上述的較長久研究計劃時，我便義不容辭地出面為他們擔當一個催生的角色。

首先我便著手起草一篇研究的方向與內容的初步提案，這個提案自然免不了從七、八十年代漢學家們對韋伯的儒家倫理

與經濟發展的批判與重新詮釋說起，然後說明這個計劃的企圖並非只是在延續前此「亞洲四小龍」經濟發展與現代化的討論，而是希望在世紀轉換的特殊情境與思維之下，匯集邀約人文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各不同領域的學者，共同對中華文化的前景作全面性與批判性的當代化檢討與反省，冀望能從現代的眼光探討中華文化與華人社會的內在特性開始，進而檢討這些文化特性與當代世界性價值觀的關係，以及與之相互接軌與互補的可能性，最後再以全人類種族與文明延續與永續發展為前提，探究、詮釋中華文化在人類文明長河中可能產生的持久與正面意義。

研究計劃的提案雖然擬定了，但是找什麼人來主持，以及執行的形式與細節如何釐定則是一個大問題。我自己因健康欠佳，精力不夠，實在是力不從心，雖是好友的重托也不敢接受。經過慎重考慮之後，特別向韓董事長推薦了兩位對中華文化有長久研究且成就斐然的青壯史學家－黃俊傑教授與李弘祺教授出面主持這一計畫。黃俊傑教授是美國華盛頓大學的歷史學博士，現任臺大歷史系教授，中研院中國文哲所研究合聘研究員，他是當代孟子學研究的執牛耳者，主持過許多的研究計劃。他對東亞儒學的研究有傑出的成果，曾獲傑出人才講座，而且在台灣的大學院校推動通識教育也有重大的貢獻。李弘祺教授是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專攻宋代教育與科舉。現任紐約市立大學城市學院（The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的歷史系教授兼亞洲研究課程主任，也是該校研究院的博士課程指導教授，他除了在中國教育史有重要的專著以

外，對中西文化交流史也有廣泛的興趣。現在也主持中西史學比較研究的計劃。兩位教授與韓董事長及江執行長會面數次之後都覺得極為投合，黃、李二位對韓董事長的熱心與慷慨更為佩服，於是欣然接受這項頗為艱鉅但極具時代與永續意義的計劃主持工作，而我也得以一方面鬆一口氣，另一方面也可以對老友有所交代，自己則只以「義務顧問」的身份參與計畫的推動，也為中華文化研究盡一份心意而深為慶幸。

黃、李二位先生在多方面商量研議之後，認為這樣龐大而企圖心極深遠且課題繁多的計劃，恐怕只有以系列性連貫的學術研討會來執行才能達到效果，所以向基金會建議整個計劃以五年為期，每年舉行二至三次研討會，每一次會議邀約各領域學者就一個主題提出論文參加研討，然後結集成一系列論文集出版。他們並向基金會建議把這一總體研究計劃定名為「中華文明的廿一世紀新意義」，並希望在真正執行計畫之前能有一年的準備期間作為先驅計劃（Pilot Project）期，以便更周詳地對計劃內容、範圍與理論架構進行規劃。韓董事長對二位的建議非常滿意，力請兩位立即開始執行，他自己則出乎大家預期地即時要江執行長開立專戶劃撥全部所需經費以便支應！

在一九九九年九月至二〇〇〇年八月的前驅計劃結束之後，黃、李兩位教授不但組成一批青壯年學者實際參與工作，而且釐定具體的研究內容專題，包括以下五項主題及不少分題：

I. 中華文化與當代文化的特色

1. 華人文化的特色；
2. 當代文化的特色；

3. 台灣文化與中華文化的辨證關係。

II. 比較文化的理論基礎

III. 中國文化圈的過去與未來及其與東亞文化的互動

1. 韓國傳統文化與中國文化，及其對中國文化之詮釋；
2. 日本傳統文化與中國文化，及其對中國文化之詮釋；
3. 越南文化與中國文化，及其對中國文化之詮釋。

IV. 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中華文化

V. 中華文化的變與不變；變的活力與界限。

看過上述的研討主題範圍之後，我個人覺得十分貼切周全，對計劃的執行更增大信心。這一套《中華文明與二十一世紀叢書》的出版，不免想起1951至1962年代美國亞洲學會的中國思想研究委員會（Committee in Chinese thought,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所編的有關儒家思想的五本系列研討會論文集，以及在1966至1969年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ACLS-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與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SSRC-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共同支持所屬的當代中國研究聯合委員會（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所編的有關中國文化與社會的四本系列研討會論文集（兩套論文集後來均由史坦福大學出版社刊行，成為近代研究中國文化的經典書籍）。當然我們現在執行的系列研討會以及其即將刊行的論文集與上述兩系列出版物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參加研討會的人都是本國人或華裔學者，而參與者對中華文化的探討都能兼具主位（emic）與客位（etic）的觀點以進行詮釋與批判，並且學者們也都體會當代中華文化有其在不同地區的發展意義及其相互

之間的辯證關係，所以這套論文集如完整出版將較前舉兩系列論文集更具現代意義，我個人也企望這一套論文集能具有與他們相同的水準而受到學界的同樣重視。在這第一輯論文集出版之時，我個人特別要對黃俊傑、李弘祺以及參與研討會的全體學者表示最誠摯的敬意，也要對全力支持這一系列研討會的喜瑪拉雅基金會韓董事長、江執行長表達衷心的感佩與謝意，同時更切望五年計劃中的全部研討會成果都能如期地陸續出版成冊，提供愛好中華文化的學者與讀者們一套新的研讀參考典籍。

李亦園

二〇〇二年四月六日寫於
台北近郊南港中央研究院

導 言

中國教育的經驗對東亞地區有很大的影響。朝鮮和日本從唐代開始已經開始系統地輸入中國教育的各種措施。它們的影響一直持續到至少十九世紀末年。過去的一千年當中，可以說中國文化是創造了一個所謂東亞的文化圈，而這個文化圈的主體不外是教育。本卷書收集了十五篇文章，主要是討論中國教育史裏的兩個重要的機構，即書院和科舉。它們都曾經影響了朝鮮和日本，是東亞文化或至少教育圈裏面的重要成分。要瞭解中、朝、日三地的教育經驗，我們不能不瞭解這兩個重要的教育機構是如何發展的。

東亞教育圈到了十九世紀末已經式微。不僅中國傳統教育的理想和實踐都受到了空前未有的挑戰，中國的學生甚至於大量往日本或甚至於歐美去留學，「師夷人之長技」，這是以前所未曾有的現象。臺灣從1895年以後，割讓給日本，所以也引進了日本的教育。這種「二千年來所未有之變局」（李鴻章語）把整個東亞的教育格局作了一個大翻轉。今天，追念過去中國教育的種種經驗和特色，不能不令人有無限的感慨。

以下我想就中國的書院經驗做一個簡單的回憶。我也想就科舉在東亞歷史的角色做一個簡短的反省，補充我在上卷的〈導論：中國的教育、科舉與文化〉所沒有觸及的課題，反省中國

教育在東亞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這個角色的歷史意義及現代華人對它所應作的反省。

我也會對臺灣在日本統治下的教育史的研究做一個檢討，並提出一些現代化思想以及後殖民主義觀念所影響的研究方法及觀點的問題。

最後，我也會討論一下中外交流對中國教育的影響。中西文明的對遇造成了許多交流的契機。但是教育思想和實踐的相互了解並不是十分容易的。它們對中國本身所作出的衝擊值得我們深入地反省。

中國的書院

書院一詞從八世紀以來就已經出現。¹ 私家學者常稱自己的書齋為書院。到了第九、十世紀，由家庭或家族興辦的私人學校也稱為書院。這期間，書院發揮了補充官學的功能，而特別在宋代統一了中國以後，家庭式的書院培養年輕子弟參加科舉考試，進入政府任官，成為統治階層的一員，發揮很大的作用。

朱熹（1130-1200）在中國書院發展的歷史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在十九歲時（西元1148年）就以極優異的成績通

¹ 現在可以找到最早使用書院這兩個字的是唐代人蘇師道，他的「司空山記」一文應當早過唐玄宗時代的「集賢書院」、「麗正書院」。參看鄧洪波：《中國書院史》（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也參考本卷鄧先生論中國書院教育的文章。

過科舉考試。然而，他很快就意識到教育應該有更遠大的目標，而不只是通過科舉考試而已，因此下定決心，提倡一個不以科舉為做學問中心的運動——創辦書院。這個運動在他有生之年就已經影響整個南中國。從此，書院變成了中國教育的重要機構。許多書院都曾懸掛朱熹題字的牌匾。

朱熹的教育理想強調要免於政府的干涉；他還認為，以通過科舉考試為教育的目標雖很實際，但太庸俗，教育的理想應該不只於此。他要學者真能在書院找到他們求學的理想。與他同時，但思想不同的陸九淵（1139-1193）也接受他的信念，認為學者必須擺脫流俗的學校教育，轉向書院去追求真正的學問。他指出書院才能真正體現中國教育的傳統，並且認為稱書院為「精舍」並無不妥。雖然佛教僧侶特別喜歡用「精舍」來命名個人修行的齋舍，但他指出「精舍」這個詞源起於漢代經師的私人講學。所以陸九淵認為精舍是個適用於書院的好名稱，朱熹同意他的看法。日後許多書院都以精舍來稱呼院中師長的齋舍。

在中國教育史上，宋明理學（現在有學者認為應該稱為「道學」）在開闢私人教育空間的努力上做出了難以估量的貢獻。蒙古人在西元一二七八年亡宋時，中國（包括北方本來受金人統治的地區）已經興辦了超過四百間的書院。² 本書中姜廣輝教授所寫的〈宋代書院制度與理學的形成〉一文主要就是在追述書院與朱、陸所提倡的「理學」之間的關係。他所注意到的經

² 或說超過六百家。參看本卷蕭永明的〈書院與社會教化〉一文。

濟、學術及社會文化的背景是我在上面所略略提到，但沒有發揮的，正好讓我們更清楚地知道理學是如何在書院的外在條件和環境裏孕育、滋長、而茁壯成功的。

書院、山林和中國傳統教育的理想

宋代時嶽麓書院以歷史最為悠久而聞名，它原來是一座佛寺。但是在西元第十世紀末開始變成儒者講學的地方。佛教傳入中國以後，認為山林是能讓人觀照內在的好環境，因此中國人開始喜愛到山林退隱，讀書。難以到達的深山幽絕之處逐漸吸引佛教的僧侶和道教的修行者、乃至於儒家的學者前來建立私學。禪宗南方始祖慧遠法師（344-416）選擇退避到廬山上隱居，三十年足不出虎溪，成為美談。儒家學者迅速模仿這個做法，並且大力提倡。嶽麓固然如此，嵩陽書院也是好例子。這所學校位於現今河南省嵩山南側的山腳下，此地從南北朝（第五世紀）以來就以佛、道教的活動而享有盛名。信徒們也相信身在靈山之中，更能獲得真正的啟悟或知識的想法。唐末，嵩山成立了書院，代表儒家也接受山林講學的理想。過去許多學者認為書院的創設與規章受到了佛教禪林清規的影響，這個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不過禪林清規的起源一直並不是那麼清楚，真至於可以說沒有早過中唐（第八、九世紀），而那時書院已經出現，因此兩者之間的關係不是很直接。我們不如說佛教的戒律思想早對書院有啟發，而佛教對山林的嚮往也對儒家的學者有一定的影響。

書院所代表的教育哲學，以及朱熹在闡述書院的必要性時所處的歷史背景，都和同一個目標緊密相連，就是只有在平和與隱蔽的環境下，才能發展真正的學術。像朱、陸這樣偉大的教育家很容易吸引學子前來聽講和研討（陸九淵是位了不起的演說家，而朱熹則偏好師生間親密的對談）。他們建立書院的地方也很快就成為勝地。象山書院在陸九淵死後享譽數百年。朱熹逃避迫害、退隱到現今福建省的武夷山，並建立武夷「精舍」，這裡（包括武夷山）也成為學生或一般讀書人常來瞻仰的勝跡。

在傳統中國，教育的中心目的始終是訓練學子應試、中舉、仕官，以協助天子治理天下。科舉考試在第十一世紀臻於成熟。大約一百年之後，朱熹開始倡導書院的理想，但在同時就有數十萬的學子正投身於三年一度的考試。也就是說當時大多數的年輕男子如果能接受教育，其主要目的不外是為了通過科舉。因此，書院必須標榜獨立的教學理念和目的，來和官學競爭。

朱熹及其後人對教育的主張非常成功，得到大眾的肯定，而書院也開始普及。但是學生們參加科舉考試的還是很多。結果，受教育的年輕人繼續參加科舉考試，但也同時進入書院就讀。書院的師長們只能期望學子們會帶著儒家的道德理想進入政府服務。

到了明朝中葉（十五、十六世紀），在城市地區，也開始興建越來越多的書院。這就挑戰了上面所說的「山林講學」的理想。許多書院甚至取代了官學，成為人們偏愛的教育機構。這種情形常被稱為是「官學化」，其實「官學化」早在元朝

(1278-1365)已經開始，因為元朝政府規定書院的「山長」（院長）必須由政府委任，而許多書院也由地方官員主導建立。明代時，官學的品質日益低落，淪為學子登錄學籍、參加地方學校考試的地方，教學大致停廢。連參加科舉考試的實際準備工作都在書院中進行。到了十八世紀，清政府乾脆讓書院享有童生的名額，與官學競爭。在這種情形下，書院的數目日益增加。許多書院興建在都市中心，滿足居住在城市附近的學子對教育的需求。書院可說已經遠離原來山林講學的理想。但是，山林講學的理念仍然在一般的思想家心中激引他們的熱誠。

在城市中興建的書院日益增加，有助中國都市化的進程。明末（十六、七世紀）中國的經濟也正好展現了市民生活的繁榮局面，所以書院的建設也同時跟著改變。書院成為城市教育與思想文化活動的中心：地方上的詩人到書院聚會賦詩、政府官員在書院舉行儒教的禮儀與慶典。但最重要的是，從十六世紀中葉起，思想家（其中以王陽明[1472-1528]最引人矚目）開始重視普及於民眾的教育。他們相信，所有人都具備相等的良知良能去追求道德的完善。公開演講變成提昇庶民教育水平的手段。因此為了推動大眾教育，書院設在鄰近城市的地方，這樣才能觸及到廣大的聽眾。十六、七世紀有許多書院舉行講會，讓民眾登記參加。這些普及於民眾的社會教育活動在帝制中國晚期的政治史與思想文化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相較之下，雖然陽明的弟子們（像王艮[1483-1541]）主張凡人皆可以為堯舜，因此對樵夫、牧者也可以傳聖人之學。然而，這樣的想法未免過分高調，在荒野郊外進行這樣的事，不切實際，只

是陽明的人性學說的確對書院在城市裏普及的現象作出相當的貢獻。

書院環境所發生的變化表示人們對教育理想和教學方法的認知也在轉變。例如有名的東林書院，它正座落於江蘇省名城無錫市的正中心。校園規模不大，並不起眼。然而，在十七世紀的上半葉，這裡是講會的中心。抗議宦官濫權的集會和批評政府腐敗的演講激怒朝廷，以致於書院的領導人遭到迫害或清算。然而，東林的理念成為明末政治運動的精神力量，深刻地影響了後代的人。如今書院舊址歸入名為東林小學的校區中，每年有十萬以上的遊客前來參觀，緬懷採用大眾路線教學法而令人敬佩的知識人。

以上的討論集中於書院如何教育傳統中國的大眾，形成影響。傳統中國教育的理想常常稱為「教化」，而它的對象就是老百姓。換句話說，教育對中國人來說是廣義的對一般大眾的施教，而不只指少數統治階層的弟子所受的經典、科舉之學。後者只是這整個過程的一部份。至少這是我一向對傳統中國人所說的「教育」觀念的看法。本卷蕭永明先生的文章，「書院與社會教化」討論的正是這一個課題。對蕭永明來說，書院裏的「學生」不再只是小孩子或年輕人。書院是一個集合社會大眾來參加各種「教化」活動的地方。當然，蕭先生和其他很多當前中國國內的學者一樣，對書院採取比較正面的評價，甚至於對政府透過書院來控制人民的思想似乎也不願加以批判。我覺得這是學者們常常有的態度，對自己所研究的東西不免產生感情。總地來說，我們當然還是承認書院在社會教化上所產生

的作用是沒有其他任何非政府的機構所可以比擬的，而且大致也是正面的。

從離羣索居的山林讀書理想到普及民間的社會講學，書院作為社會的機構到了明代中期以後已經徹底完成了。任何對書院歷史有興趣的人都不能不關心這樣的發展和特色。

書院建築與學以自得

中國書院最突出的特點可能是它的建築。雖然書院建築的基本風格和官學相似，但私學最終在中國發展自己的類型，並塑造了中國校園建築的理想。

簡單來說，中國的傳統書院對招收的學生提供相對個別化的指導。這一點是中國教育的特色。十二世紀時，公開講學還不重要，因此個別的教授才是教學的基本方法。書院的學生人數一般不會不超過數十人：當陸九淵在白鹿洞書院、或朱熹在嶽麓書院講學時，聽眾可能指來自學生而已；當時這種活動還沒有社會功能。因此，書院的建築物基本上只是、師生專用的課室和住宿之處。

書院日益發展，擔負起收藏書籍的重要功能。唐朝的李泌以系統搜羅圖書，並將藏書之所命名為書院而名著於時，讓許多人非常羨慕。從九世紀綿延到十一世紀的江西陳氏，也把家族設立的學校和圖書樓命名為「書堂」或書院。據說江南士人多有在這裡研習的。鄰近陳氏書堂的另外一所家族學校（胡氏